

中国的教育婚姻匹配变迁 与家庭收入差距

石磊 李路路

[摘要] 本文基于社会排斥的视角, 分析了中国城市社会中教育婚姻匹配的变迁如何影响家庭收入差距。结果发现, 在市场转型和高等教育扩张的背景下, 随着教育收益率的不断上升以及人们对于婚姻经济理性的认同提高, 一方面, 高等受教育层级在择偶偏好上的对外排斥增强, 与其他教育层级之间的通婚壁垒强度提升, 由此导致教育同类婚向高等教育层级集聚; 同时,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在择偶上受到其他教育层级的排斥程度亦有增强。另一方面, 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性不断提高, 在受高等教育扩张影响的世代中已几近完全相同。在此条件下, 教育婚姻匹配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家庭收入差距。

[关键词] 教育婚姻匹配; 社会排斥; 教育同类婚; 家庭收入差距

一、导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明确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中国的全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自2008年后出现下降, 但是目前仍然位处收入差距相对较高的行列。^① 而相比于个人层次的收入差距, 家庭之间的收入不平衡更加不容乐观。不单是中国, 即使在西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和地区, 家庭收入差距也十分严峻。^② 正因如此, 探究影响家庭收入差距的因素及机制, 一直是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重点研究课题。

在诸多影响家庭收入差距的因素中, 婚姻匹配在近近年来备受关注。所谓婚姻匹配指的是男女择偶婚配的非随机过程。一般而言, 具有相同或相似社会属性的群体结婚, 也即同类婚(homogamy)是婚姻匹配的主导模式。同类婚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收入、财富等社会经济资源在家庭层面的聚合模式, 进而影响家庭收入差距。例如, 有针对美国的研究显示, 夫妻双方收入上的同类成婚可以解释美国自1967—2005年间家庭收入差距增加的50%以上。^③ 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 教育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中轴, 对个人的收入等社会经济资源的获得具有深刻的影响。在此背景

作者: 石磊,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 shilei2014@ruc.edu.cn; 李路路,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 lilulu@ruc.edu.cn。

①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编:《中国住户调查统计年鉴(2019)》,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9。

② A. Chevan, and R. Stokes. “Growth in Family Income Inequality, 1970–1990: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Demographic Change”. *Demography*, 2000, 37: 365–380.

③ M. Cancian, and D. Reed.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Wives’ Earnings on Family Income Inequalit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8, 80 (1): 73–79.

下，教育婚姻匹配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渐成研究的热点。^① 例如有学者发现，美国在近半个世纪中的贫富分化几乎可以完全归因于教育婚姻匹配。^② 由此可见，若要更加全面、细致地解释社会中的家庭收入差距状况及其成因，教育婚姻匹配的角色是不容小觑的。

然而，就中国社会而言，关于教育婚姻匹配如何影响家庭收入差距的问题却长期被忽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中国某些特殊的历史与现实因素造成的。其一，教育的社会经济价值是教育同类婚形成及其对家庭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的先决条件之一。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政治、家庭出身等身份是影响资源与机会获取的重要因素，而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对其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相对较弱。其二，教育同类婚程度及其影响家庭收入差距的强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口在各教育层级上的分布。如果大部分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集中于低教育层次，而高等教育层级的人数较少，那么，即使教育同类婚较多，其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是十分有限的，而这一现象曾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③ 其三，教育同类婚程度及其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强度还取决于男女两性人口各自在受教育等级上的分布结构。有研究表明，许多国家教育同类婚程度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④ 而在中国社会，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中的性别不平衡曾长期存在。^⑤

但是，上述背景在进入 21 世纪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推动其转变的主要力量之一便是市场转型，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提升了教育的社会经济价值。有研究发现，中国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下降后，自改革开放初期开始一路走高。^⑥ 尤其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十年间，城市居民教育收益率上涨了 3 倍，在 21 世纪初已经超过了 10%，基本达到了国际平均水平。^⑦ 除市场转型之外，另一推动前述因素发生变化的重要力量便是肇始于 1999 年的大学扩招。一方面，大学扩招使得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激增^⑧，仅在十年间中国便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学校毛入学率达到了 48.1%，即将由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进入到普及化阶段。^⑨ 另一方面，大学扩招促进了高等教育层次的性别平衡，对于 1985 年后出生的世代，女性在大学入学率上甚至超越了男性。^⑩

总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由于教育的社会经济价值较低（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之

① R. Breen, and L. Salazar.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ting and Earnings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1, 117 (3): 808-843; R. Breen, and S. H. Andersen.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ting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Denmark". *Demography*, 2012, 49: 867-887.

② J. Greenwood, et al. "Marry Your Like: Assortative Mating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 (5): 348-353.

③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1952 年，每百万人口中在校的大学生仅为 3.3 人，当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人数为 3.2 万人。从 1965 年至 1975 年的十年间，高校毕业人数从 18.6 万下降至 11.9 万。在大学扩招政策正式出台的前一年（1998 年），每百万人口中在校的大学生为 27.3 人，当年高校毕业人数已达 83 万人，然而，在 15 岁及以上的人口，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仅占 3.41%。参见 1999 年和 2000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④ HP. Blossfeld, and S. Drobnic. *Careers of Coupl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From Male Breadwinner to Dual Famil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⑤ 在高等教育方面，即使在新中国成立 30 多年后的 1980 年，高等学校中的女学生比例也只有 23.4%。在大学扩招政策出台前的 1998 年，这一比例也仅上升至 38.3%。参见 1999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⑥ 郭小弦、张顺：《中国城市居民教育收益率的变动趋势及其收入分配效应》，载《复旦教育论坛》，2014（3）。

⑦ 李实、丁赛：《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6）。

⑧ 2017 年，普通本专科学校的招生人数已达到 761.5 万，毕业生人数达到 735.8 万，是 1978 年招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的 19 倍和 45 倍。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教育程度的人占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 15.5%，占 25 岁及以上人口的 18%。参见 2018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⑨ 《教育部：我国高等教育即将进入普及化阶段》，参见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6535715704302338&wfr=spider&for=pc>。

⑩ 李路路主编：《社会分层与流动》，204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前)、高等教育层级的人数较少且性别分布不平衡,教育婚姻匹配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中国社会长期被忽视。然而,在近二十年间,中国市场转型的加深与大学扩招政策的推行,极大增强了教育的社会经济价值,促进了高等教育层次人口的增多与性别分布的平衡,由此为高等教育层次同类婚的增加,进而影响家庭收入差距提供了条件。有鉴于此,本文将聚焦于中国社会的教育婚姻匹配变迁如何作用于家庭收入差距。

二、文献综述

关于教育婚姻匹配如何影响家庭收入差距,已有研究已经给出了一套简单直接的逻辑,即以教育同类婚为主导的婚配模式会影响有价值的资源,主要是经济资源在家庭层面的聚合方式,进而影响家庭间的收入差距^①,也即资源聚合机制。然而,纵观现有的研究,仍旧存在两大问题:第一,欠缺过程机制的分析。多数学者单纯地考察社会中的教育同类婚程度与家庭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而忽视了二者之间的作用过程,由此便可能导致结论上的谬误。如果教育同类婚集聚在教育层级的低端,那么即使教育同类婚程度较高,其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依然是有限的。再如,如果教育和收入两类婚姻匹配之间在模式上具有较大的差异,则教育婚姻匹配及其变化对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便可能微乎其微。^② 第二,忽视教育婚姻匹配变迁背后的宏观背景。前文提及,诸如市场化、工业化、高等教育扩张等社会过程,不仅会直接影响教育婚姻匹配本身的模式及变化,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育婚姻匹配所能产生的效应。

由此本文认为,首先,教育婚姻匹配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两大过程性因素:一是教育同类婚在整体受教育层级上的分布结构,而这一结构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婚姻市场上各受教育程度群体之间基于特定的择偶偏好而形成的通婚壁垒;二是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性程度,只有当二者之间的关联性程度较高时,教育同类婚模式方可导致收入等经济资源在家庭层面的集聚,从而影响家庭收入差距。其次,高等教育扩张、市场转型等宏观社会过程会显著作用于以上两大过程性因素,进而影响教育婚姻匹配对家庭收入差距所能产生的效应。基于这一认识,本文的文献回顾主要围绕这两大过程性因素及它们在高等教育扩张等社会背景下的变迁展开。

(一) 教育同类婚分布结构

关于在高等教育扩张下教育同类婚分布结构如何变化的问题,目前有两种较为主流的观点,分别为资源偏好强化假设和封闭弱化假设。

1. 资源偏好强化假设

该理论认为婚姻市场上的男女均具有特定的资源偏好,并以此为基础选择配偶,其中最主要的是社会经济资源偏好。在传统社会中,女性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且其主要精力多用于照料子女等家务工作,因此,对于男性来说,婚配对象的受教育程度并不是其最看重的择偶标准。然而,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不断提高,对家庭的经济贡献逐渐增大,在此背景下,男性在择偶中的社会经济资源偏好大幅增强。^③ 基于上述逻辑,资源偏好强化假设认为,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教育同类婚会逐渐增多,且在分布结构上会向高等教育层次集聚。

① C. R. Schwartz. "Earnings Inequality and the Changing Association between Spouses' Earn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0, 115 (5): 1524 - 1557.

② R. Breen, and L. Salazar.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ting and Earnings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1, 117 (3): 808 - 843.

③ R. D. Mare. "Five Decades of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ti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1, 56: 15 - 32; V. K. Oppenheimer. "Women's Rising Employment and the Future of the Famil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94, 20 (2): 293 - 342.

2. 封闭弱化假设

与资源偏好强化假设相反，封闭弱化假设指出，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受教育程度作为择偶标准的重要性在高等受教育群体中逐渐降低。这一假设认为，高等受教育程度者之所以有较强的同类婚偏好，是因为教育同类婚是一种维护地位优势的社会封闭手段。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较少时，一方面他们更容易认识到自身的精英地位，从而增强了其排外意识，另一方面也相对提升了高等受教育程度的价值，由此使得该群体更偏好与高等受教育程度者成婚。然而，高等教育扩张极大增加了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的规模，从而贬低了高等受教育程度的资源性价值及其作为优势特权的象征性意义，由此削弱了社会精英群体在择偶上对高等受教育程度的偏好，最终便导致了高等教育层次同类婚程度的下降。^①

资源偏好强化假设与封闭弱化假设对于高等教育扩张背景下教育同类婚分布结构的变化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二者的共性是它们均将受教育程度视为有价值的社会经济资源，而主要的分歧在于随着高等教育扩张的发展，受教育程度是否会出现贬值。这一点是需要基于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进行分析的。此外，无论是资源偏好强化假设还是封闭弱化假设均存在着一些缺陷。例如，这两个假设均聚焦于高等教育层次，而忽视了中国其他教育层次的择偶偏好及由此决定的同类婚分布结构在高等教育扩张过程中的变化，这极有可能会产生“管窥蠡测”的问题。

（二）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的关联性

前文提及，教育与收入两类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性程度是影响教育婚姻匹配如何作用于家庭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只有当二者的关联性程度较高时，教育同类婚才可以导致收入等经济资源的聚合。已有关于两类婚姻匹配之间关联性的研究存在两种相对立的观点。

1. 理性择偶观

理性择偶观认为，由于家庭中的夫妻双方往往共享对方所具有的资源，因此在理性原则的支配下，婚姻市场上的男女均具有较强的经济资源偏好，并据此来择偶婚配。由于在现代社会，受教育水平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因而适婚男女通常均倾向于选择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作为配偶^②，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具有相同或相似受教育程度的人之间结婚。^③ 所以，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必然是高度关联的。

2. 资源交换观

与理性择偶观类似，资源交换论也同样认为个体的择偶偏好是以理性原则为基础的，最终目标是利益的最大化。但是，该理论认为，婚配双方的资源偏好是由其所缺乏的资源决定的，择偶行为本质上是一种交换。具体而言，夫妻在婚姻中所获得的效益有赖于双方在不对称资源或特征上的交换，从而实现互惠。^④ 在现代社会，受教育程度虽然与个人的收入相关，但更多的代表一种文化资源。如果个体在受教育程度上是向下婚，那么在收入方面便可能是向上婚。^⑤ 因此，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并不具有较强的关联性。

理性选择观和资源交换观均认为婚姻市场上的男女主要基于理性原则来择偶婚配，然而对于教

^① J. Smits. "Social Closure among the Higher Educated: Trends in Educational Homogamy in 55 Countri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03, 32 (2): 251 - 277.

^② M. Kalmijn. "Intermarriage and Homogamy: Causes, Patterns, Trend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8, 24: 395 - 421.

^③ C. R. Schwartz. "Trends and Variation in Assortative Mating: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3, 39 (1): 451 - 470.

^④ R. K. Merton. "Intermarriage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Fact and Theory". *Psychiatry*, 1941, 4 (3): 361 - 374.

^⑤ C. R. Schwartz. "Earnings Inequality and the Changing Association between Spouses' Earn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0, 115 (5): 1524 - 1557.

育与收入婚姻匹配的关联性问题却持有迥然不同的判断。归根结底,二者主要的分歧在于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之间关联性的高低。当教育的经济收益较高时,人们在择偶上的经济偏好会导致收入同类婚和教育同类婚程度同步提高,由此使得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具有高度的关联性,符合理性择偶观的逻辑。当教育的经济收益较低时,受教育程度并不是影响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而更可能被视为是一种文化资源,与收入在婚姻匹配中是可交换的,由此便可能出现资源交换观所述的情形,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性较低。

综上所述,无论是教育同类婚的分布结构还是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性程度均依赖两大基本因素:一是受教育程度与收入之间的关联,也即教育收益率,二是各受教育程度者的择偶偏好。二者在高等教育扩张等宏观社会进程中的变动,决定了教育同类婚分布结构和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关联性的变化,进而影响了教育婚姻匹配的变迁对家庭收入差距的效应。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将在中国高等教育扩张、市场转型等大背景下,考察受教育程度与收入之间的关联和个人择偶偏好的变化,并以此来分析中国社会中教育同类婚分布结构、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关联性的特征,最后揭示教育婚姻匹配的变迁对于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

三、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 社会排斥的分析框架

已有研究大多将婚姻匹配视作一个“谁倾向于和谁结婚”的问题,这种视角极易导致研究者忽视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由此,本文认为,在分析人们的择偶婚配时,更宜采用一种排斥的视角,即将个体的婚姻匹配视为一个“谁倾向于不和谁结婚”的问题,在这种视角下同类婚的形成是个体在择偶上排斥其他属性个体的结果。

具体到教育婚姻匹配,当教育的收益率较高且人们主要受经济理性的影响择偶时,一方面,婚姻市场中的男女在择偶偏好上均倾向于选择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作为配偶,并且排斥受教育程度较低者。由于受教育程度是有明确的上限的,所以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在排斥受教育程度较低者的情况下更可能与相同受教育水平的对象结婚,而次一级受教育水平的个体在受到上一级受教育程度者的排斥,同时也排斥下级受教育程度者的情况下,也多与相同受教育水平的对象结婚,由此,这种择偶偏好上的社会排斥在各受教育层级之间构筑起了通婚壁垒。因为不同受教育程度者在择偶偏好上的对外排斥程度不同,所以各受教育层级间的通婚壁垒存在强度上的差异,并且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各受教育层级间的通婚壁垒强度及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社会的教育同类婚分布模式。另一方面,较高的教育收益率和择偶上的经济理性使得各受教育群体间在择偶上的排斥距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等同于他们之间的经济距离,由此便会导致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具有较高的关联性。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从社会排斥的视角出发,提出一个教育择偶排斥的机制,并构建如图1所示的分析框架。具体而言,本文认为,教育婚姻匹配之所以是非随机的,是因为各受教育程度者在择偶上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对外排斥,这种排斥在各受教育层级之间构建起强度不一的通婚壁垒,从而影响了全社会教育同类婚的分布结构以及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的关联性,进而作用于家庭收入差距。本文将依据这一分析框架和中国社会的高等教育扩张、市场转型等特殊的历史社会情境,来讨论教育婚姻匹配的变迁对于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

(二) 中国情境下的研究假设

中国的高等教育扩张相比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具有以下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在速度和规模上发展迅猛,二是在市场转型的大背景下开展。这两个特征使得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和人们的择偶偏好在高等教育扩张的背景下呈现出不同一般的特异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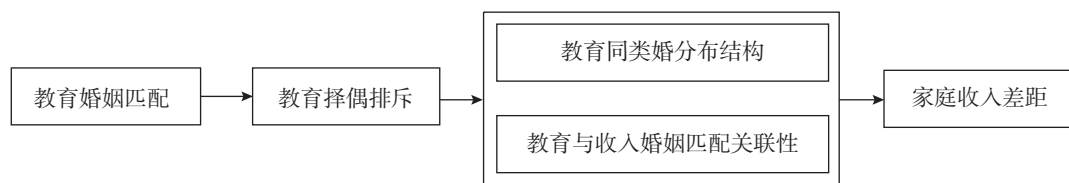


图1 分析框架

就教育收益率而言，随着市场转型的推进，以受教育程度为标志的人力资本的回报大幅提升。此外，有学者指出，由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教育长期处于贬值的状态，导致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快速发展期，高素质的劳动力始终是供不应求的。由此，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增长与高等教育扩张是相伴而行的。^①

除了教育收益率外，教育机会获得情况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教育的经济价值变化。就中国而言，自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出现了许多最大化不平等维持假设（MMI 假设）的特征，表现为较高阶层在各教育阶段的教育机会获得上具有一定的优势^②，而高等教育扩张并没有减少阶层间的教育机会差距。^③由此可知，社会优势阶层依然视高等教育为优质的资源，并没有出现封闭的弱化。

高等教育扩张对于受教育程度的经济价值的影响并不仅限于高等教育层级。例如“挤出效应”（crowding out effect）和工作竞争理论便指出，高等教育扩张所导致的学历膨胀增加了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从而提高了许多岗位对学历的要求，由此使得低等受教育程度者不得不接受工资水平较低的工作甚至是退出劳动力市场。^④就中国而言，有研究发现，从2003—2008年间，要求大学学历的工作职位急剧增加，而要求较低学历的工作职位在这一时期内则大幅减少。^⑤

就人们的择偶观念而言，市场转型也同样影响了人们的择偶观念。有数据显示，在21世纪初的10年间，中国民众对“女性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认同率由34%上升至44%。^⑥无独有偶，李煜和徐安琪的研究也发现，改革开放后，男女在择偶中特别看重对方的受教育程度、收入、职业等社会经济地位因素，而这些因素在改革开放前人们的择偶中则较少被强调。他们认为，这是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职业大多由国家统一安排，个体之间的薪资收入在平均主义的影响下并无太大差别；同时，在这一时期金钱物质在意识形态上被污名化，极大降低了这些因素在个人择偶中的重要性。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行，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在此背景下，收入、财富等经济基础被视为是婚姻必不可少的条件，从而使得教育、收入等成为人们重要的择偶标准。^⑦

综上所述，在中国独特的高等教育扩张与市场转型的背景下，一方面，教育的收益率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收益率持续增长，而受教育程度较低者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另一方面，在择偶观念上，人们对于婚姻经济理性和功利性的认同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可以提出如下推论和假设：

首先，高等受教育群体在教育扩张中依旧甚至更加有动机通过教育同类婚来实现阶层封闭，由

① 陈晓宇等：《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变化与启示》，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2）。

② 郝大海：《中国城市教育分层研究（1949—2003）》，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6）。

③ 李春玲：《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载《社会学研究》，2010（3）。

④ R. Collins. “Credential Inflation and the Future of Universities”. *Ital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11, 3（2）: 228-251; J. C. Von Ours, and G. Ridder. “Job Matching and Job Competition: Are Lower Educated Workers at the Back of Job Queu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5, 39（9）: 1717-1731.

⑤ A. Hu. “Proliferation of Educational Credentials, Changing Economic Returns, and Rising Occupational Education Requirements: Evidence in Urban China from 2003 to 2008”.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013, 28（4）: 448-466.

⑥ 风笑天、肖洁：《中国性别角色意识的城乡差异研究》，载《人文杂志》，2014（11）。

⑦ 李煜、许安琪：《婚姻市场中的青年择偶》，4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此在教育择偶偏好上对其他受教育层级的排斥会进一步增强,教育同类婚会显著增多;同时,受教育程度较低者由于社会经济地位进一步降低,从而可能遭遇其他受教育群体在择偶偏好上更加强烈的排斥。

假设1:在高等教育扩张的背景下,高等受教育层级在择偶上对其他教育层级的排斥增强,教育同类婚显著增多;同时,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者在择偶上受到其他教育层级的排斥增强。

其次,教育收益率的提升以及民众对婚姻经济理性认同的强化,使得各受教育群体在婚姻匹配上的排斥距离与他们之间的经济距离日益紧密相关,由此导致教育与收入两类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性不断增强。

假设2:中国社会的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的关联性越来越强。

最后,在教育同类婚逐渐向高等教育层级聚集,并且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关联性增强的条件下,由教育婚姻匹配所引发的收入聚合很可能导致收入在家庭层面出现“强强联合”,进而扩大家庭收入差距。

假设3:中国社会中教育婚姻匹配的变迁会扩大家庭收入差距。

四、研究设计

(一) 数据与变量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当代中国生活史与社会变迁调查(下文简称LHSCCC)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下文简称CGSS),由于要分析各受教育群体的择偶偏好与由此决定的教育同类婚分布结构,以及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的关联性在不同时期的变迁,因而需要较大的样本量,为此,本文合并了LHSCCC1996年和CGSS2003—2015年之间已有的调查数据。^①根据研究目的,本文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其一,将研究样本限定为在结婚前已获得最高学历的初婚者,因而删除了未婚、再婚有配偶、婚后获得最高学历的人员。其二,由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构成比较复杂,并且各家庭成员的独立收入不易区分,因此本文仅将分析的对象限定为具有城市户籍的样本。其三,在分析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性,以及教育婚姻匹配的变迁对于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时,为了保证受访者有劳动收入,本文进一步将样本年龄限定为16—59岁。

变量方面,本文主要的变量包括:婚配双方的受教育程度,依据被访者的性别进一步区分出丈夫与妻子的受教育水平,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四个等级。出生世代,根据被访者的出生日期,将被访者划分为1960—1965年(C1)、1966—1973年(C2)、1974—1980年(C3)、1981—1993(C4)年4个出生世代。按照7/6/3/3/4学制计算,这四个出生世代是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C4世代基本上是在1999年及以后进入大学,是受高等教育扩张影响的一代。夫妻双方的收入,在分析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性程度时,由于无法获知受访者在结婚时的收入信息,因此本文将受访者及配偶所属受教育层级在其结婚年份的收入中位数作为对他们收入水平的估计测量,如果某一结婚年份的收入信息缺失,使用时间最相近的调查年份中的收入信息填补。^②最后,根据各年份结婚人数的比例,对收入变量进行加权平均处理。由此,本文获得了1994—1996年、2001—2015年各年份中结婚者所属受教育层级的收入水平信息。家庭收入,在直接考察教育婚姻匹配的变迁对于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时,本文将受访者和配偶在一年中所获得的

^① 具体包括CGSS2003, 2005, 2006, 2008, 2010, 2011, 2012, 2013, 2015。这些年份的数据,虽然部分在抽样框上不一致,但是可比较的。参见Zhou, X. and Y. Xie. "Market Transi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Trends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9, 124 (6): 1810—1847。

^② 本文假定各受教育层级的收入水平在三年中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为了避免某一年份的数据重复次数过多,当某一缺失年份的信息可以用多个相邻年份数据估计补足时,本文选择重复次数最少的相邻年份数据。

工资性收入（包括基本工资、福利津贴、奖金等）取均值，计算出家庭平均年收入。经数据处理后，本文在教育同类婚分布结构部分的样本量为 15 134，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关联性部分的样本量为 3 695。

（二）分析策略

在探究高等教育扩张背景下教育同类婚分布结构和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关联性的变迁时，本文采用对数线性模型来分析教育婚姻匹配的方形表数据。^① 在教育同类婚分布结构方面，本文首先运用跨越模型来展现不同受教育层级之间的通婚壁垒，然后采用迭代比例拟合法（iterative proportional fitting，下文简称 IPF）将男女双方的教育边际分布在第一个出生世代不变，进而通过考察其他三个出生世代中婚姻壁垒的结果，来揭示各受教育层级间婚姻壁垒强度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各受教育程度群体在择偶偏好上的对外排斥所决定的，以此来检验教育择偶排斥机制。跨越模型的设定如下所示：

$$\log F_{ijk} = \mu + \mu_i^W + \mu_j^H + \mu_k^C + \mu_{ik}^{WC} + \mu_{jk}^{HC} + \gamma_{ijk}^{HWC}$$

$$\gamma_{ijk}^{HWC} = \begin{cases} \sum_{q=j}^{i-1} \gamma_{qk} & (i > j) \\ \sum_{q=i}^{j-1} \gamma_{qk} & (i < j) \\ 0 & (i = j) \end{cases}$$

式中 W 、 H 、 C 分别表示行变量妻子的受教育程度，列变量丈夫的受教育程度和时期变量出生世代，其取值分别对应下标 i 、 j 、 k 。 F_{ijk} 表示在 k 出生世代夫妇所形成的方形表中，当妻子给定的受教育程度为 i 时，丈夫的受教育程度相应取值为 j 的期望频数。 μ 表示相应方形表完全服从均匀分布，即夫妇的受教育程度相互独立、婚配完全随机时平均预期频数的自然对数。 μ_i^W 、 μ_j^H 、 μ_k^C 分别表示行变量、列变量与世代变量的主效应。 μ_{ik}^{WC} 与 μ_{jk}^{HC} 分别代表行变量、列变量和世代变量的交互效应。 γ_{ijk}^{HWC} 为跨层难度系数，表示各等级受教育群体跨越相邻受教育程度之间障碍的可能性，也即教育婚姻壁垒的强度。

在分析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性时，本文首先以每一结婚年份各教育层级的收入水平代替受教育程度的分类，估计线性乘线性模型。模型中的 x_i 与 y_i 分别表示妻子和丈夫所属受教育层级的收入水平， β 表示 x 与 y 之间的关联系数。

$$\log F_{ij} = \mu + \mu_i^W + \mu_j^H + \beta x_i y_i$$

其次，估计行列效应模型，该模型将行列效应当作是有待估计的未知量，可以视为夫妻受教育程度之间最佳的线性乘线性关系。模型中的 ϕ_i 与 ϕ_j 分别表示妻子与丈夫受教育层级的估计测量得分。通过将线性乘线性模型与行列效应模型进行比较，便可以计算出收入婚姻匹配与教育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性程度。

$$\log F_{ij} = \mu + \mu_i^W + \mu_j^H + j\phi_i + i\phi_j$$

在具体考察了教育同类婚的分布结构和教育与收入两类婚姻匹配的关联性后，本文着重分析教育婚姻匹配的变迁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首先，本文根据夫妻双方的受教育程度构建出 16 类教育婚姻匹配家庭，由此一来，教育同类婚分布结构的变化可以大致体现在全社会各类教育婚配家庭

^① 以下涉及的所有对数线性模型均以独立模型为基准，并与准独立模型进行比较来判断拟合效果，独立模型假定夫妻的受教育程度并不存在显著的关联，准独立模型假定除了对角线外，夫妻在受教育程度上的匹配是随机的。

所占比例的变动中,而教育与收入两类婚姻匹配的关联性变化则大致可以体现在各教育婚配类型家庭在平均收入水平上的变动中。其次,基于上述认识,本文选用泰尔指数来测量家庭收入差距,该指标可以通过各教育婚配类型家庭所占的比例及平均收入水平等计算得出,公式如下。其中, T 为总体的泰尔指数, j 为分组,本文中为16类教育婚姻匹配家庭, \bar{x}_j 为第 j 类家庭的平均收入, p_j 是第 j 类家庭占有所有类型家庭的比例, T_j 为第 j 类家庭内部的泰尔指数。

$$T = \sum_j p_j \frac{\bar{x}_j}{\sum_j \bar{x}_j p_j} \ln \left(\frac{\bar{x}_j}{\sum_j \bar{x}_j p_j} \right) + \sum_j p_j \frac{\bar{x}_j}{\sum_j \bar{x}_j p_j} T_j$$

最后,考虑到受高等教育扩张影响的世代在进入21世纪后逐步达到适婚年龄,本文拟选择LHSCC1996年和CGSS2006年、2015年的数据,运用一个效应分解的方法来考察教育婚配在20年间的变化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①鉴于2015年的数据在城乡样本分布上很不平衡^②,因此本文将时间最接近的2013年数据与2015年数据合并,作为第三阶段的分析数据。具体的分析步骤是:首先,分别计算出1996年、2006年和2015(2013)年中泰尔指数的实际值;其次,分别将2006年和2015(2013)年中各教育婚配家庭的比例以及平均收入水平替换为1996年的情形,重新计算泰尔指数;最后,通过将新计算值与原有实际值进行比较来判断家庭收入差距的变化。

五、研究结果

(一) 教育同类婚分布结构的变迁

图2从描述的角度展示了总体的教育同类婚和各受教育层级的教育同类婚在各世代之间的变化。就总体的教育同类婚而言,从第一个世代到第三个世代间缓慢上升,在受高等教育扩张影响的第四个世代上升幅度变大。分受教育层级来看,大学及以上教育同类婚随着世代的变化迅速攀升,到了受高等教育扩张影响的第四个世代已经成为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教育同类婚类型。相比之下,其他教育层级的同类婚随着世代的发展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这意味着总体教育同类婚在各世代尤其是第四个世代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高等教育同类婚的大幅增加所导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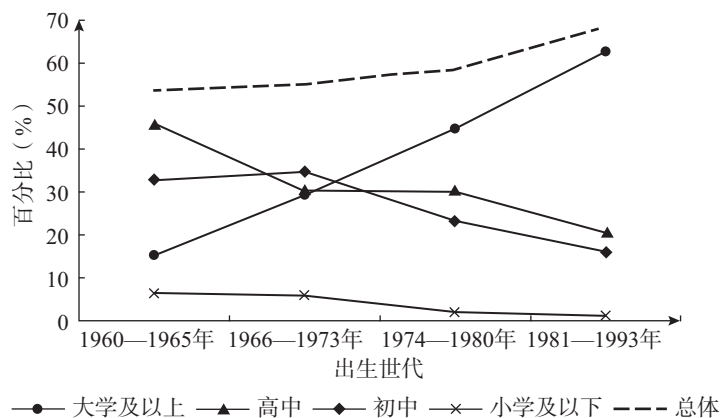


图2 教育同类婚变化趋势

① 为了使各年份的收入具有可比性,本文根据2015年的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各年份的收入数据进行了调整。

② 在CGSS2015年的数据中,农村户口人数近7000人,而城市户口人数仅为4000人左右,按照本文的分析要求进行限定后,城市样本仅剩871人。

如前所述，本文拟用跨越模型来考察各受教育群体在择偶上的社会排斥如何影响不同受教育层级之间的通婚壁垒，进而决定了教育同类婚的分布结构及其变迁。表 1 展示了与独立模型和准独立模型相比，跨越模型的拟合效果。从 BIC 等标准上来判断，跨越模型的拟合效果显著优于前两个模型。

表 1 跨越模型拟合结果

模型	Deviance	df	Δ	BIC
独立模型	6 221.909	36	27.21	5 881.03
准独立模型	983.964	20	6.56	794.59
跨越模型	212.733	24	4.20	-14.52

根据跨越模型的估计，图 3 揭示了不同受教育程度与相邻受教育层级之间的婚姻壁垒强度在不同世代之间的变化。由图可知，大学及以上与高中之间的通婚壁垒强度 (γ_1) 从第一个世代到第三个世代出现下降，而在受高等教育扩张影响的第四个世代中迅速回升，并达到最高值；高中和初中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婚姻壁垒强度 (γ_2) 一直在增强；初中和小学及以下教育层级之间的婚姻壁垒强度 (γ_3) 在第一个世代和第二个世代之间持续上升，随后在第三个世代中下降，在第四个世代重新开始回升。这一数据结果表明高等教育扩张提升了大学及以上、小学及以下与其他受教育层级间的婚姻壁垒强度，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文所提出的假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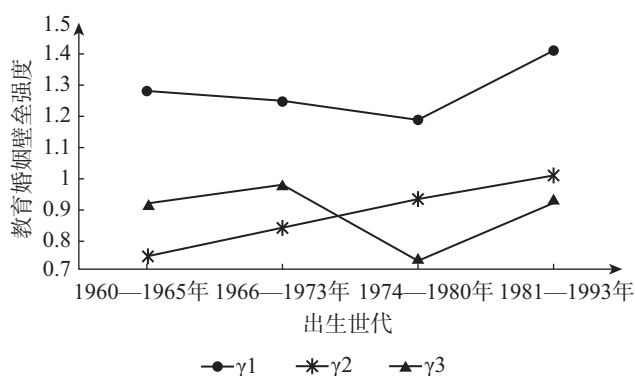


图 3 教育婚姻壁垒强度变迁趋势

上述教育婚姻壁垒的变化与各受教育群体在择偶偏好上的对外排斥是什么关系呢？本文使用迭代比例拟合法将夫妻双方受教育程度的边际分布控制在第一个世代，然后重新计算第二至第四个世代中各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婚姻壁垒强度，以此来揭示各受教育层级间在择偶偏好上的对外排斥程度的变化，结果如图 4 所示。控制了配偶可获得性的影响后，初中与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之间的教育择偶排斥 (γ_3) 在第三个世代出现明显下降，在受高等教育扩张影响的第四个世代大幅回升。大学及以上和高中之间在择偶偏好上的排斥 (γ_1) 在前三个世代出现下降后，在第四个世代中回升。需要说明的是，第三个世代和第四个世代的婚姻壁垒强度差异并未通过显著性的检验，这说明了配偶可获得性变化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尽管如此，单就择偶偏好而言，其在受高等教育扩张影响的世代中的增强，确实提高了大学及以上和高中群体之间的婚姻壁垒强度。

（二）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的关联性

在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的关联性方面，本文运用对数线性模型分别考察了各世代中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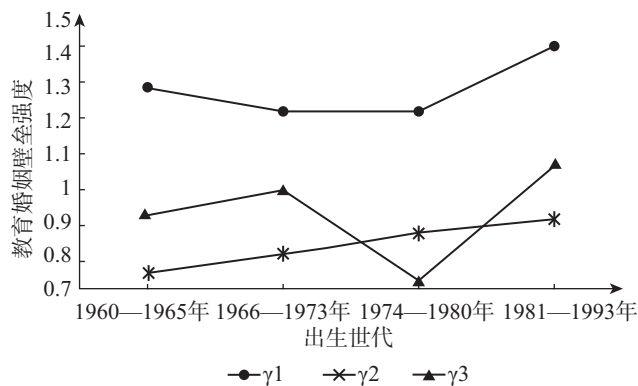


图4 教育择偶排斥变迁

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性程度，模型拟合结果如表2所示^①，线性乘线性模型与行列效应模型的比较结果如图5所示。

表2 模型拟合结果

模型	Deviance	df	Δ	BIC
世代1 (1960—1973年)				
独立模型	374.687	9	25.76	313.56
准独立模型	38.848	5	3.77	4.89
线性乘线性模型	156.622	8	15.53	102.28
行列效应模型	17.248	4	4.03	-9.92
世代2 (1974—1980年)				
独立模型	634.612	9	28.37	569.79
准独立模型	93.428	5	4.39	57.42
线性乘线性模型	50.701	8	6.53	-6.91
行列效应模型	6.021	4	1.10	-22.79
世代3 (1981—1993年)				
独立模型	620.399	9	33.75	558.61
准独立模型	28.930	5	2.17	-5.40
线性乘线性模型	31.280	8	4.02	-23.65
行列效应模型	25.601	4	4.32	-1.86

根据表2，在世代1中，线性乘线性模型和行列效应模型比独立模型有更好的拟合度，但线性乘线性模型的效果并不理想。根据图5中的线性乘线性模型和行列效应模型的结果计算，夫妻收入上的关联可以解释行列效应模型中二者受教育程度关联的61% (0.582/0.954)。在世代2中，线性乘线性模型的效果较之世代1有所改善，通过计算，夫妻收入上的关联可以解释行列效应模型中二者受教育程度关联的93% (0.92/0.991)。在世代3中，线性乘线性模型具有最优的拟合效果，经计算，夫妻收入上的关联可以解释二者受教育程度关联的99% (0.95/0.959)。以上结果表明，

^① 由于经数据处理后，1960—1965年出生世代的样本量过少，因此本文将其与第二个时代合并为1960—1973年。

中国社会中的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性不断增强，尤其是在受高等教育扩张影响的世代中，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甚至近乎完全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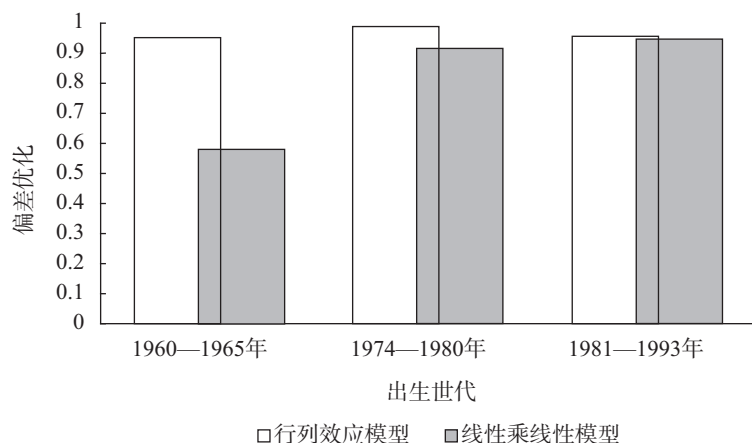


图5 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的关联性及变迁

（三）教育婚姻匹配的变迁与家庭收入差距

在考察了教育同类婚的分布结构和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性后，本文运用效应分解方法，对应分析了1996—2015年近二十年间，各类型教育婚配家庭比例以及平均收入的变化对于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如图6和图7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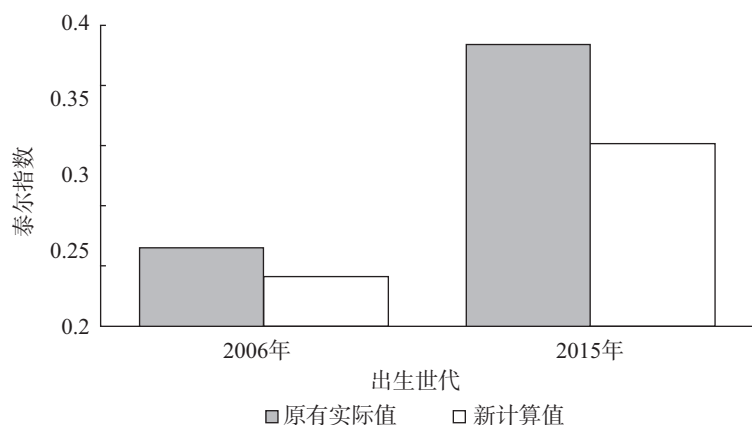


图6 各类教育婚配家庭比例影响结果

就各教育婚配家庭的比例而言，经过计算，在1996年，高等教育同类婚家庭占有所有类型家庭的比例仅为6.9%，到了十年后的2006年，该比例上升为12.68%，而时至2015年，高等教育同类婚家庭的比例已经上升到33.35%，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教育婚配家庭类型。这进一步表明，随着受高等教育扩张影响的世代逐步进入适婚年龄，教育同类婚逐步向高等教育层级集聚。为了估计这一变化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将各类教育婚配家庭的比例保持在1996年不变，发现2006年与2015年中的泰尔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通过计算可知，各类教育婚配家庭比例在1996—2006年十年中的变化导致泰尔指数上升了8%，而其在1996—2015年近二十年间的变化导致泰尔指数上升了21%。

采用同样的方法，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各类家庭平均收入水平的变化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根

据图7中的结果计算,各类教育婚配家庭平均收入水平在1996—2006年十年中的变化导致泰尔指数上升了17%,而其在1996—2015年近二十年间的变化导致泰尔指数上升了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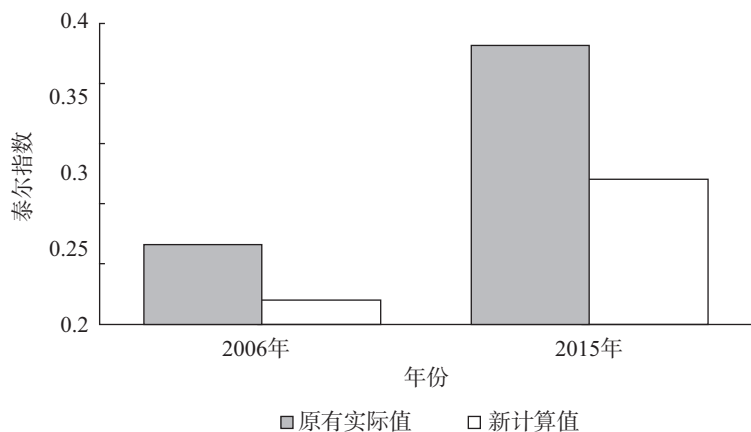


图7 各类教育婚配家庭平均收入影响结果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中国高等教育扩张以及市场转型的背景,从社会排斥的视角出发,探究了教育婚姻匹配中的择偶排斥如何影响了教育同类婚的分布结构以及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性,进而作用于家庭收入差距。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就教育同类婚的分布结构而言,从描述统计的结果来看,中国城市中的教育同类婚在受高等教育扩张影响的世代中明显增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高等教育层级的同类婚迅猛增加。根据跨越模型的结果,对于受高等教育扩张影响的世代,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者在择偶偏好上的对外排斥增强,这导致大学及以上教育层级和其他教育层级之间的通婚壁垒强度提升,从而使得全社会的教育同类婚逐渐向高等教育层级集聚。这一结果表明,伴随着高等教育扩张,高等受教育程度的社会经济回报不断增长,并没有失去其作为地位优势的象征性意义。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人们对婚姻经济理性和功利性的认同显著提高的背景下,高等受教育程度者在择偶上的对外排斥未减反增。此外,本文发现,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者所受到的择偶排斥在受高等教育扩张的世代中大幅增强,这可能是由于高等教育扩张所带来的学历膨胀使得他们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不断恶化,其相对的社会经济地位出现下降。这一现象可以作为对人们基于理性原则择偶的又一佐证。

就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性而言,本文发现,在教育收益率提升以及民众对婚姻经济理性认同强化的条件下,各受教育群体在婚姻匹配上的排斥距离与他们之间的经济距离日益紧密相关,从而导致教育与收入两类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性不断增强。尤其是在受高等教育扩张影响的世代中,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几乎完全是相同的。

教育同类婚向高等教育层级集聚,并且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的高度关联无疑会导致收入等经济资源在家庭层面出现“强强联合”的情形,从而拉大家庭收入差距。此外,虽然在新近的世代中,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者的数量大幅减少,但是,鉴于他们在高等教育扩张后受到其他教育层级的择偶排斥明显增强,从而会对应出现收入上的“弱势累积”,进一步导致家庭收入差距的扩大。为了检验上述观点,并且考虑到受高等教育扩张影响的世代在21世纪后逐步进入适婚年龄,本文使用LHSCC1996年、CGSS2006年以及2015年与2013年的合并数据,分析了各类教育婚配家庭比例和平均收入水平在二十年间的变化对于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各类型家庭比例的变化主要是高等教育层次同类婚的增加使得家庭收入差距在1996—2015年间增加了21%,而各类家庭

平均收入水平的变化则使得家庭收入差距在二十年中增加了 31%。这在一定程度上分别支持了教育同类婚向高等教育层级集聚、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关联性的增强对于家庭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

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表明，在高等教育扩张及市场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城市社会中的教育婚姻匹配变迁导致家庭收入差距的拉大。值得警惕的是，除了家庭收入差距外，教育婚姻匹配还会显著影响长期的代际不平等。例如，一些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同类婚夫妻不仅具有文化、经济等资源上的优势，同时在培养子代上有更好的分工合作，从而使得他们的孩子在教育成就获得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①，这可能使得教育婚姻匹配所导致的收入等方面的不平等在代际间得以延续甚至是强化。正因如此，如何缓解婚姻匹配对于收入等社会不平衡的影响，以促进社会平衡发展，进一步畅通社会流动通道，仍然是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不可置否，本文仍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主要有以下几点：在分析框架上，本文出于简化分析的目的只考察了受教育程度标准上的社会排斥，而现实中婚姻匹配上的社会排斥可能同时涉及家庭背景、容貌、户籍等多个标准，并且不同标准之间可能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在数据方面，由于缺少被访者和配偶在结婚时的收入信息，本文用相应年份中各受教育群体的收入中位数进行了代替，而这一做法无疑去掉了许多个人层次的异质性，有可能导致过高估计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度。此外，本文为了扩大样本量，将许多年份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合并，然而部分年份的调查在抽样框上并不一致，由此可能对结论产生影响。希望上述缺陷能在后续的研究中得到改进。

Changes in Education-based Assortative Matching and the Gap of Household Income in China

SHI Lei, LI Lulu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ciological Theory & Method,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xclus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how changes in education-based marriage affect household income gap in Chinese urban society. In the context of market transition and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rate of return to education continues to rise, and more and more people become economically rational in mate selection. As a result, those who have received higher education are more exclusive on marital preference, tending to choose their partners who also have received higher education. Accordingly, those who have only received elementary education are more likely to be excluded from building marital ties with those who have received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meantim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ducation-based marriage and income-based marriages becomes more and more visible, and this trend remains nearly the same in different generations affected by the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o some extent, the change in education-based marriage has widened the gap of household income.

Key words: Education-based assortative matching; Social exclusion; Educational homogamy; Gap of household income

(责任编辑 李 理)

^① A. Beck, and C. Gonzalez-Sancho.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ting and Children's School Readiness". Working Paper, 2009; 1-38, <https://fragilefamilies.princeton.edu/sites/fragilefamilies/files/wp09-05-ff.pdf>.